

导 言

“右翼”一词，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1792年9月至1795年10月）。当时，国民公会的765名议员形成三派：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100人为激进派——雅各宾派；以罗兰为首的165人为保守派——吉伦特派；其余500人为立场不稳定的中间派。从议长席望去，保守的吉伦特派坐在右翼的席位上，激进的雅各宾派坐在左翼的席位上（因座次在高位，又被称为“山岳派”），不稳定的中间派恰好坐在平而低的中间席位上（故又被称为“沼泽派”或“平原派”）。从此，凡政治思想保守的集团、政党、阶级，或集团、政党、阶级中政治思想倾向保守的部分，就被称为“右翼”。后来，“右翼”一词泛指奉行封建主义、民族主义、超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排外主义、沙文主义、帝国主义的反共、反和平、反民主自由、反社会进步的集团、政党、阶级或其中的一部分。本书所谓“日本右翼势力”，除具备上述一般“右翼”的这些特征外，还明显具有日本的民族特质：（1）深信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对天皇和国家绝对忠诚；（2）忽视理论，注重行动，崇尚暴力，迷信武运，热衷暗杀和政变，对现行体制实施颠覆；（3）信奉封建集权主义、天皇中心主义，对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极端仇视；（4）奉行超国家主义、侵略扩张主义，对弱邻攻战杀伐、屠戮相

加，以实现“八紘一宇”之妄想。本书所谓“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系指战后以来日本国内推卸战争责任，否认侵略罪行，美化侵略战争，甚至图谋将国家重新引上军国主义老路的由右翼政客、右翼财阀、右翼军人、右翼学者和民间极右分子及其组织组成的一股社会恶势力。

日本右翼势力这个“政治癌瘤”的存在，迄今已逾百年。它不仅在战前将日本民族拖进了灾难的深渊和给亚洲邻国造成了亘古未有的民族灾难，而且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中仍在不断恶化着日本社会的“肌体”和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时至今日已再度对日本政局走向、中日关系走势和东亚和平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这一情形不仅使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深感忧虑，而且引起了亚洲邻国特别是中国的极大担忧和高度警惕。因为就实质而言，日本在战前疯狂为祸亚洲邻国的过程，就是战前日本右翼势力“孳生”、“膨胀”、“肆虐”的过程；战后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以延宕二十多年才得以实现，复交后两国关系所以又很快跌入低谷，成为目前中外双边关系中“剪不断，理还乱”、既棘手又麻烦的一对双边关系，也主要就是经历了“削弱”、“复活”、“抬头”、“蠢动”过程的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长期阻挠和破坏所致。早在中日复交前，周恩来就曾意味深长地指出：“要日本抛弃美国，抛弃台湾，这不仅短期内做不到，长期也困难。日本自民党虽然分许多派，但在台湾问题上都是一致地含糊其辞，大多有野心。吉田茂、岸信介等人就是想把台湾分出去。在台湾和祖国统一之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日本的斗争是长期的。”^①这番话可谓一针见血，迄今读来仍感回味无穷。中日复交后，随着教科书事件、靖国神社事件、

辛向阳主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4页。

钓鱼岛事件的频频发生，中共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江泽民，也都对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和支持“台独”问题给予了密切关注，并一再提醒国人保持高度警惕。邓小平仅在1987年5月至9月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三次提到了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5月5日，他在会见宇都宫德马等日本朋友时首先指出：“如果说中日关系有点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民担心日本有很少很少一部分人，其中可能有的有政治影响的人，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我们只担心这一点。”^①6月4日，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矢野绚也时又指出：“战后日本一部分人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想要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这些人人数不多，能量不小，我们对此始终是担心的。……总有少数人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台湾，没有忘记从另外的角度解释战后日本宪法，没有忘记制造中日之间的隔阂，这是很不幸的事情。”^②9月3日，他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不无忧虑地再一次提到了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复活的倾向，指出：“中日只有友好，而且是世代友好下去。这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基本立场。但是，日本当局确实做了一些对中国不友好的事情。我们更担心的还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这种倾向值得警惕。我不是讲日本人民，日本人民是希望友好的，日本舆论界的态度也是好的，除了个别报刊，总是赞成和平赞成友好的。但有一股有影响的政界人士，搞军国主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③1996年9月3日，江泽民在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9—390页。

^③ 潘俊峰、杨军民主编：《是总结，还是翻案——兼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

接受法国《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佩雷菲特采访时明确指出：“日本国内不时出现一些人公然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事情，特别是最近以来，一些内阁成员竟然络绎不绝地参拜靖国神社，为东条英机之流的亡灵招魂，一些国会议员竟然纷纷散布掩饰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罪恶事实的奇谈怪论，这表明日本国内确实有那么一股势力企图重温军国主义的旧梦。他们的言行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愤慨。日本今后究竟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还是别的什么道路，应当引起世人的高度警惕。”^① 1998年11月26日，江泽民在与小渊惠三相会谈时，再次就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郑重指出：“坦率地讲，在各国列强中，日本是加害中国最重的国家。……回顾中日邦交26年的历程，不能不遗憾地指出，日本国内不断有人在历史问题上制造事端，否认甚至歪曲历史事实。这些都极大地伤害了战争受害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的感情，干扰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中方从维护历史真相和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大局出发，不能不作出必要的反应。……从历史上看，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是有负于中华民族的。……日本国内在台湾问题上仍存在一些错误的认识。”^② 两天后即11月28日，江泽民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进一步明确而坚定地提出：我们“绝不能允许任何形式的军国主义思潮和势力重新抬头”^③。从中不难看出：周恩来不仅敏锐地洞察到日本政要对台湾“大多有野心”，而且极富预见性地提醒国人要做好同日本右翼势力进行长

① 紫水、效时：《警惕日本军国主义》，金城出版社1997年版，首页。

② 徐宝康、于青：《江泽民同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举行会谈，日本政府就侵华历史再次表示反省和道歉》，《人民日报》1998年11月27日。

③ 江泽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1998年11月29日。

期斗争的准备；邓小平不仅肯定“战后日本一部分人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想要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而且再三告诫国人“这些人人数不多，能量不小”，特别“值得警惕”；江泽民不但根据新情况进一步认定“日本国内确实有那么一股势力企图重温军国主义的旧梦”，而且郑重向日方表明了中国“绝不能允许任何形式的军国主义思潮和势力重新抬头”的坚定决心和严正立场。应当说，中国领导人对日本右翼势力政治图谋和现有能量的判断以及所取态度是正确的、有的放矢的。

有鉴于此，本书试就曾疯狂为祸亚洲近邻并对今天的日本政局走向、中日关系走势和东亚和平再度构成潜在威胁的日本右翼势力，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

第一章主要从组织、思想、活动三个方面对战前日本右翼势力进行了追述。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1. 孳生时期（1881—1911）

日本右翼势力的源流，是明治初年一度为新政权的诞生立下过汗马功劳却又很快随着明治改革的深入而丧失既得利益的部分保守派土族。他们在发动一系列武装叛乱失败后进一步分化，其多数成为日后日本右翼运动的始作俑者和这一时期日本右翼势力的骨干成员。1881年2月，右翼鼻祖头山满在九州福岡建立的玄洋社，是战前日本右翼团体之“始祖”，奠定了日本百年右翼运动的基础。此间虽然尚未产生有影响的右翼思想家，其思想主张也仅仅反映在各右翼团体的纲领中而未成系统，但其对内建立天皇独裁专制统治和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思想主张——天皇中心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却成为后来系统的法西斯理论的思想源流和核心内容。日本右翼势力政治活动伊始，就具有将矛头同时指向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之特点：对内，凡是被认为有碍天皇独裁专

制统治建立的日本政要，均在暗杀之列；对外，则自觉地充当了日本政府侵略扩张的急先锋和马前卒，这也是此间日本右翼势力政治活动之重心。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日本右翼势力无论在组织上、思想上还是在活动方式和手法上，都为其后继者提供了范例和蓝本。

2. 膨胀时期（1912—1930）

从大正政变到“九·一八”事变前夕，是战前日本右翼势力迅速膨胀的一个时期。此间，右翼团体急剧增加，尤其与玄洋社、黑龙会等传统右翼团体不同的“革新右翼”（含军人右翼）团体大量孳生。大川周明等人在1919年8月建立的犹存社，是战前日本第一个法西斯性质的民间右翼团体。如同明治时期的玄洋社卵翼出黑龙会等众多传统右翼团体一样，犹存社则“孵化”出很多类似大化会的“革新右翼”即法西斯右翼团体。桥本欣五郎在1930年建立的樱会，则是此间军人法西斯团体的典型代表。这一时期右翼思想主张的核心内容除传统的天皇中心主义、大亚细亚主义外，还有新生的更具影响力的法西斯主义，尤其增加了极具煽动性、欺骗性的“国家改造”主张。这些思想主张除体现在右翼团体各自的纲领之中外，主要反映在北一辉、大川周明、权藤成卿、橘孝三郎等法西斯思想家们的著作中。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主要集中在被称作“日本法西斯圣经”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中，包括“国家改造”论、“天皇中心”论、“亚细亚扩张”论等；大川周明的法西斯思想主要反映在《复兴亚细亚诸问题》等著述中，包括天皇中心主义、“东西对抗”论、“大东亚秩序建设”论等；权藤成卿、橘孝三郎提出的，则是封建色彩极为浓厚的包括农本主义、自治主义两层含义的农本自治主义，可谓日本法西斯的思想“特产”。右翼势力的思想主张实是在“道义”、“自由”、“平等”、“友爱”、“革命”、“民族解放”等幌子下

行专制性“天皇中心主义”和侵略性“大亚细亚主义”之实，而且明显增加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新内容。此间，日本右翼势力的政治活动已由前一时期侧重对外转向了对内对外两个方面。这一方面是由日本国内几乎同时出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大正德谟克拉西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局面所使然，同时也与北一辉等人富于煽动性和迷惑力的以“国家改造”为核心内容的法西斯思想在青年特别是青年将校中产生共鸣息息相关。无论“为国分忧”的“任侠右翼”，还是偏重实践的“行动右翼”，对内对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工农运动竭尽破坏之能事，自觉充当了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对外则在推动政府实施强硬外交、进行战争舆论动员、为关东军刺探情报等诸多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随着日本法西斯思想的蔓延和向军队渗透，已在天皇制日本社会内部出现了传统右翼与“革新右翼”（即法西斯右翼）、民间右翼和军队右翼并存的局面，整个日本社会加速法西斯化。

3. 肆虐时期（1931—1945）

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是日本右翼势力逞凶肆虐、为祸东亚的一个时期。截止1939年，日本全国共有右翼团体1733个，成员达182192人，战前右翼至此发展到巅峰。随着法西斯势力掌控国家政权和军国主义战争体制的形成，日本右翼势力实已演变成为国家军国主义势力，日本法西斯思想也与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完全重叠，逐渐系统化为“石原构想”、“亚洲协同体”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既指导了这一时期的侵略战争，也出人意料地在客观上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战争翻案提供了“理论依据”。换句话说，这一时期除了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的法西斯思想在继续发挥指导作用外，日本法西斯右翼思想主张已基本上化为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石原构想”主要集中

在石原莞尔的《战争史大观》等一系列文章和“计划”中，具体包括“最终战争”论（目标）、“东亚联盟”论（手段）等；蜡山政道的以区域主义为核心的“东亚协同比”论，主要反映在《东亚协同比与帝国主义》等著作中，具体包括“克服中国的抗日民族主义”、由日本领导东亚的“防卫和开发”等内容；而由日本战争政府炮制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主要反映在帝国《基本国策纲要》等文件和松冈洋右等法西斯政府领导人的讲话中，具体包括建设政治上以日本为“盟主”、经济上“大东亚各国”向日本“开放资源”、文化上在东方文化的“救世主”日本的领导下实现东洋文化之“复兴”等内容，这也是战前完全付诸实施并最具有现实欺骗性和久远影响力的一种侵略思想。正是在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的法西斯思想以及上述法西斯理论的指导下，日本右翼势力对内通过制造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一系列恐怖、暗杀和军事政变事件，最终建立起军部法西斯独裁政权；对外通过协助政府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卢沟桥事变、珍珠港事件等一个又一个侵略“事变”或“事件”，将国家引上了侵略战争不断升级的不归之途。对内制造恐怖、暗杀、政变事件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同步进行，是这一时期日本右翼势力的主要特点，也是与德意两国法西斯化（先国内法西斯化，后对外侵略扩张）有所不同的日本法西斯化的一大特征。这股孽生于明治时期、膨胀于大正时代、肆虐于昭和前期的社会恶势力，不仅给亚洲邻国造成了亘古未有的巨大灾难，最终也使日本民族本身濒临毁灭境地。如此创深痛剧的历史教训，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的危害性，值得今天每一个日本人沉思和铭记。

第二章集中对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演变及其各阶段特点进行了史的考察。曾经给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造成深重灾难的日

本右翼势力这个“政治癌瘤”，本应随着其依附体——“大日本帝国”的败亡而被彻底割除，但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国内的和国际的诸多因素所致，日本右翼势力在战后初期渡过了一个短暂的“冬眠”期之后很快又复苏过来，时至今日已经演变成为一股能够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的危险势力。换言之，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与战前日本右翼势力具有明显的承继性，可谓一脉相承。其演变，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

1. 削弱时期（1945—1951）

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为了“保证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之威胁”，尤其为了“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制定了《关于开除不宜从事公务者的公职之文件》、《关于废除若干政党、政治结社、协会及其他团体之文件》等多个铲除日本右翼势力的文件。结果，有 233 个右翼团体被解散，210288 名右翼分子被解除公职，日本右翼势力被严重削弱，跌入其百年右翼运动之低谷。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冷战时期的过早到来和日本政府试图利用右翼残余势力挽救天皇制国体，即使在战后初期甚至在 1946 年 1 月至 1951 年 4 月的数年整肃期间，被勒令解散的右翼团体成员也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停止活动，而且还孽生出一批以全新面孔出现的新右翼团体。作为对战败的回应，前者或通过发动一系列武装叛乱来阻挠日本战败投降，或用自杀方式承担战败责任以向天皇“谢罪”，或制造一系列袭杀日共干部的恐怖事件以维护天皇制国体，或通过改头换面潜匿各地搞经济活动保存和积蓄实力；就后者而言，仅在 1945 年 9 月至同年底的数月间，就有 16 个具有浓厚反共色彩、“新种国家主义”色彩、暴力团性质的新右翼团体孽生。战后初期日本右翼势力总的特点是：规模小，寿命短；具有过渡性；思想主张既与战前右翼一脉相承，又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征”。

2. 复活时期（1952—1960）

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确曾实施了一系列铲除日本右翼势力的对日政策和措施。但随着冷战时期的到来，特别是朝鲜、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作为国际反共堡垒的地位突然重要起来。因此，美国在重点扶蒋失败之后，很快将扶植的重点转向了日本。美国通过签署《旧金山和约》为日本“松绑”和通过缔结《日美安全条约》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为日本右翼势力的复活开了绿灯。结果，提前释放了包括岸信介等甲级战犯在内的所有在押战犯；几乎全部解除了对右翼分子的整肃；被解散的旧右翼团体纷纷复活，打着各种旗号的新右翼团体大量孳生，“统一战线”性质的右翼联合组织也在不断涌现。新老右翼重新整合成为一股较大的政治势力，开始对日本政局走向和对外关系施加影响。50年代前中期（1952年至1956年）日本右翼势力的特点是：多数右翼团体披上“和平”、“民主”、“自由”的外衣；积极参加议员选举；逐渐暴力团化；从事恐怖活动。50年代后期（1957年至1960年），随着甲级战犯岸信介登上首相宝座，日本右翼势力步入了一个转折期。正因为有岸信介这个强大政治靠山的包庇、纵容和提供宽松环境，日本右翼势力迅速复活并随之壮大；而日本右翼势力也知恩图报，毫不迟疑地扮演了岸信介政府镇压日本人民斗争的帮凶和打手之角色，包括协助岸内阁破坏和镇压日本人民反对“勤务评定”制度、反对修改“警职法”、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等正义斗争。组织发展迅速和对内对外政治活动频繁，是50年代后期日本右翼势力的两大特点。

3. 抬头时期（1961—1980）

池田内阁和佐藤内阁执政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的一个时期。在此背景下，已经壮大起来的日本右翼势力再度燃起了称雄世界的野心。一方面，

“大和民族优秀论”沉渣泛起；另一方面，通过整顿组织、培养骨干，不仅迅速实现了新老右翼的交替，而且呈现出迅速抬头之势。截止 1980 年，仅“行动右翼”团体就有 700 多个，约 12 万人。六七十年代日本右翼势力的特点是：以青年右翼（包括军人右翼）为主力；主张上与战前右翼接近，行动上与“新左翼”相似；活动呈分散、小型、多样化特点；对外活动以百般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中心。此间日本右翼势力的迅速抬头，为下一阶段的猖狂活动创造了条件。

4. 蠢动时期（1981—2000）

时至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已经从一个战败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在很多高科技领域向头号经济强国美国显示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在日本已经成长为“经济巨人”，日本政府又相应确立了“政治大国”目标并制定了“战后政治总决算”政治路线的大背景下，日本右翼势力在八九十年代进一步壮大并蠢动起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政界特别是执政的自民党内部的右翼政客，或自我组建右翼政治团体，或身兼民间右翼组织头目，形成一股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小的政界右翼势力。然而，一些欧美、日本学者在研究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时，却只把民间极右分子及其团体视为“右翼势力”，而将野心和能量更大、更具危险性的政界、军界、财界、学界右翼分子及其团体排除在外，这等于放跑了日本右翼势力的“中坚”力量，必须纠正这一片面、危险的研究倾向。实际上，如果把遗族会这类半官半民性质的右翼团体和终战五十周年国会议员联盟这类政界右翼团体（即“潜在右翼”，也被称作“穿西服的右翼”）计算在内，时至 2000 年，日本右翼团体逾千个，人数不下 500 万人，至少也有右翼理论家荒原朴水所说的“353 万人”。此间，日本右翼势力的思想主张和政治活动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1）竭力美化头号战犯裕仁天

皇，重树军国主义精神支柱，阴谋恢复战前天皇制；（2）再三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全面进行战争翻案；（3）顽固参拜靖国神社，为战犯“鸣冤”，为军国主义招魂；（4）百般阻挠国会通过“不战决议”，顽固奉行不反省、不道歉、不谢罪的“三不主义”；（5）不断挑战和平宪法，推动政府强化日美同盟，加速向政治大国演变和军事大国急进，妄图重温军国主义老路；（6）对内暴力恫吓进步人士，对外不断制造针对近邻国家的外交事件。这一时期日本右翼势力的特点是：野心和能量更大更具危险性的政界右翼势力“异军突起”；民间右翼势力与黑社会势力趋于同流合污；更具顽固性、煽动性和影响力。时至世纪之交，日本右翼势力已经膨胀到能够影响本国政局走向和外交走势的程度。

第三章主要横向比较了战后日德两国右翼势力的差异和两国政要“二战史观”的不同及其成因。继前两章纵向就战前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演变轨迹及其特点进行史的考察之后，本章着重横向比较了战后日德两国右翼势力的差异和两国政要“二战史观”的不同及其成因，目的在于以战后德国右翼势力和德国政要为参照，求得对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政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战后日德两国右翼势力之不同，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德国新纳粹团体和新纳粹分子几乎都是在战后成立成长起来的，与战前纳粹团体和纳粹分子没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而战前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却具有明显的继承性。（2）德国的右翼党团尚处于在野地位，还在为重新掌控国家政权积极扩大竞选；而日本的部分右翼分子和右翼团体由于本身就是执政的自民党议员和由这些议员组成的政界右翼团体，因此两国的右翼分子和右翼团体不仅在数量上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在能量上也相差十分悬殊。（3）在主

张上，日德两国右翼势力虽然都美化侵略历史，兜售“民族优越论”，鼓吹重建昔日的“帝国”，但日本右翼势力更侧重于为侵略战争翻案和“恢复天皇的国家元首地位”上，而且战前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思想主张一脉相承、如出一辙。（4）在行动上，德国右翼势力施暴的对象主要是外国人特别是外籍劳工，而日本右翼势力攻击的目标主要是国内进步人士（如，暗杀浅沼稻次郎等）；德国右翼势力关于建立“第四帝国”、建立一支新纳粹战斗部队和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张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日本右翼势力则已经将自己的主张具体而有计划地付诸了行动（如，三岛由纪夫煽动军队政变等）。（5）与德国右翼势力受到政府严厉打击、坚决取缔不同，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得到了本国政府和政要的默认、庇护和支持，而且二者彼此勾结、遥相呼应：民间右翼势力企图依靠政府和政要的庇护、支持达到自己暂时还无法达到的目的，而日本政府和政要则欲借右翼之口说出自己想说而又不便说出的话，即两国右翼势力的处境也迥然不同。

日德两国虽然同是当年的法西斯侵略国、战败国，共同对人类犯下了滔天罪行，然而不仅两国右翼势力截然不同，而且两国政要的“二战史观”也迥然不同：（1）一个对侵略战争性质和罪行坦率承认、真诚反省，一个遮遮掩掩、图谋翻案；（2）一个编撰合格的历史教科书对下一代进行正确的“二战史观”教育，一个处心积虑篡改历史教科书不让下一代了解历史真相；（3）一个主动地有计划地向受害国、受害民族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一个百般抵赖、拒不赔偿。究其原因，主要由以下六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所致：（1）两国的文化思想底蕴和宗教信仰不同；（2）两国的侵略战争历史和两国政要的个人经历不同；（3）两国政要反省战争的群众基础不同；（4）盟国对两国的战后处理和受害国对两国的态度不同；（5）战后两国的政权基础不同；（6）战后两国所

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同。

第四章主要剖析了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存在的社会基础和迅速抬头的原由。战后 50 多年来特别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所以重新抬头并蠢蠢欲动，必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这就是：（1）日本国民的“中流意识”特别是部分国民错误的“战争史观”，为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和蠢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据统计，日本国民中有 44.8% 的人认为日本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是“不得已”；有 45.5% 的人把太平洋战争视为将亚洲各国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正义战争”。日本国民意识的保守化和这般大成问题的“战争史观”，既是战后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和政权失而复得的社会基础，也是战后日本右翼势力迅速抬头的社会土壤。（2）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的发展，为日本右翼势力的迅速抬头和猖狂活动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宣告冷战时期结束，日本“保革”长期对立的“五五年体制”随之失去存在的国际依据，加之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政局的剧烈动荡，日本政治加速右倾化。这就为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和蠢动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3）渠道广、数额大的资金来源，又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和蠢动提供了充足的经济条件。战前，日本右翼势力主要靠军部保护和财阀施舍取得活动资金；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资金来源渠道要相对广泛得多，包括企业“捐赠”、强拉“赞助”、“正当”的投资经营、统治阶级的慷慨解囊等等。如此滚滚财源，是确保日本右翼势力“经久不衰”并迅速抬头、猖狂活动的物质基础。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迅速抬头、蠢蠢欲动的原由主要有三：
（1）自中世纪起积淀于日本民族心理潜层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潜在驱动。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是一种类似于宗教感

召的观念意识，它比一般的政治学说更具有煽动性和迷惑力，久远而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的心理归向和思想走势，特别是形成了与之相表里的超常的忠诚意识和以攻战杀伐的好战习性为特征的武士道精神。其形成经历了中世纪的人为培植和强化、近代以降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两个阶段。（2）二战结束时，美蒋特别是美国出于反共需要，没有彻底清算和铲除日本法西斯思想及其残余势力，且有意加以保留，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重新抬头和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种下了祸根。包括：保留日本右翼势力的精神支柱——裕仁天皇及其天皇制、提前释放全部在押战犯、几乎全部解除对右翼分子的整肃等等。（3）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重新确立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增强，重新燃起了右翼势力称雄东亚的野心。经济力量的膨胀使日本右翼势力既想通过谋建“政治大国”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形象，也欲通过重建“军事大国”以重温军国主义旧梦。正是在深植于日本民族心理土壤中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潜在驱动、美国对日本法西斯思想及其余孽的有意保留、日本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和潜在的军事强国三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日本国内“大国意识”重新抬头，军国主义思潮沉渣泛起，右翼势力开始兴风作浪。深深领教过当年日本法西斯疯狂侵略迄今仍记忆犹新、隐隐作痛的东亚各国人民，有必要警觉地注视着邻邦日本今后所要选择的道路。

第五章主要对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直接与中国相关问题抛出的一系列谬论和破坏中日关系的种种行径，进行了系统的揭露和批判。

1. 关于历史认识问题

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系统”“全面”地兜售了所谓“日本人的历史观——“自卫战争史观”、“解放战争史

观”、“英美同罪史观”等等。(1)日本右翼势力兜售的“自卫战争史观”虽然涉及日本对外侵略的一系列重大行动，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卢沟桥事变和珍珠港事件上。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把卢沟桥事变爆发的间接原因——中国“赤化”引起混乱、中国人民掀起“排日抗日运动”、中国政府奉行“革命外交”——全部推卸在中方身上，而且还将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直接原因、直接责任也几乎全部推给了中国，即荒谬地提出中方“打响了卢沟桥事变的第一枪”，是卢沟桥事变的“真凶”，具体包括“中共责任”说、“国民党责任”说、“共产国际和苏联责任”说、“偶然事件”说等等。关于珍珠港事件即太平洋战争，日本右翼势力则抛出了“ABCD包围圈逼迫”说、“美国阴谋”说、“日美矛盾激化”说、“《宣战诏书》认定”说等等，还是“与日本无关”。其实，日本右翼势力抛出的这些谬论或为道听途说，或为恶意捏造，均无确切文字材料可资证明；相反，卢沟桥事变和珍珠港事件等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是日本政府和军部长期共同谋划所为，早已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大量确凿的历史事实作出公正的结论，铁证如山。(2)日本右翼势力兜售的“解放战争史观”，主要集中在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上。日俄战争本来是新兴的日本帝国主义与老牌沙皇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而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厮杀，然而日本右翼势力在将这场战争歪曲成被帝俄逼出来的“自卫战争”的同时，还人为地将它美化成为亚洲的“代表”日本为了把黄种人从白人帝国主义的“佼佼者”——沙皇俄国的殖民统治下“拯救”出来而进行的一场“解放战争”；太平洋战争本来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和以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为目的的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法西斯侵略战争，但日本右翼势力在将这场战争歪曲成为“被ABCD包围圈逼出来的”“自卫战争”的同时，还将它美化成为

“解放大东亚”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圣战”，视而不见、闭口不谈这场所谓“大东亚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其实，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煞费苦心炮制的“大东亚战争”一词，丝毫也掩盖不了这场战争的法西斯侵略性质；战后东南亚国家的纷纷独立绝非日本“解放”所致，而是东南亚各国人民长期坚持不懈反对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最后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合起来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亚洲各国人民同旧殖民帝国共同打击的结果。换句话说，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与二战爆发前西方列强强加给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性质相同、目的一致，只是作为最后一个侵略者和殖民帝国被亚洲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打倒而已，根本不存在什么“历史功劳”和亚洲人民的“感激”问题。（3）日本右翼势力兜售的“英美同罪史观”，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谬论之一，就“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而言，日本与英美等西方列强没有什么区别。对此笔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以前英、美、法、德、意、日等列强对中国的战争均属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性质；但在30年代以后尤其自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由于日本与德意两国结成了世界法西斯同盟，成为侵略战争的策源地，而英美等国与中国等被侵略国家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因此事实上已经分属于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的日德意与美英法之间所进行的战争，不再是原来一般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已经具有法西斯侵略战争和反法西斯自卫战争之分，不能再相提并论。谬论之二：美英对“中日战争的长期化”和“大东亚战争”的爆发也有责任。对此笔者认为，无论近代史上中日之间的所谓“反目为仇”、“纠纷加剧”，还是现代史上“中日战争的长期化”，均与“第三国的介入”无关。近现代史上中日之间的一切矛盾、冲突和战争，完全由日本侵略者一手造成；而中国